年年冬至时,冷不丁的,斑鸠要开口叫,在僵硬的树枝上突然高叫,嗓子带呼噜还不太顺畅。

“咕咕——咕”“咕咕——咕”,从冬至到立春这一个多月,斑鸠开口了,叫声是断断续续的,或者上午它迎着太阳叫,或者午后最暖和时它发声,没个准当。或者,隔几天它又发声。三九严寒里,斑鸠的叫声仿佛枯树树枝里春的汁水汁液,明里暗里的,曲曲折折发声而蠕动。冬来了,那春天还远吗?鸠声是雪莱的注脚,鼓舞勤劳勇敢、不畏严寒的人。一旦立春——我们习惯叫打春,不仅是鞭打土牛,不仅说地气刹那间可以冲飞羽毛,我对斑鸠因此而加速鸣叫,立春了一呼百应的亢声鸣叫,感觉最深刻。

可是,今年立春因时而动的还有黄蜂。立春头一天,我在街头看见粉色梅花开了一树,而一只细腰黄蜂,我不能判断它是野蜂还是家蜂,约莫是只野蜂吧,嗡嗡嘤嘤趴在新花花蕊里。这“好色之徒”如此不畏冬寒,但我不能讽刺和讥笑它,我佩服它,我惊异梅花早,且吃惊与斑鸠配合唱歌的居然有蜂。自然的隐秘和奥秘,岂止是立春而飞动的一只蜂虫?

这是新冠疫情蔓延,跨年而来的又一个春节。上个春节,武汉封城的影子还在,江城梅花和樱花空开空落。今年元月,河北东北又出状况,所幸在春节临近之际柳暗花明。腊八进年,北方祭灶腊月廿三,年关歌谣唱起——“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庚子腊八和大寒节气同一天,接着2月3日立春,转眼就是除夕和春节了!

这个春节花事早

何频

这个冬天寒冷吗?我认为总体当属暖冬。它再次验证了“小寒为一岁最寒”的经验。元月5日小寒节气,我所在的地方随即零下十多度的酷寒骤然来袭,常青树香樟的叶子被撕裂,有的叶子全冻焦了。可是大自然古怪,元月中下旬,气温迅速回暖,偏高异常,2月6日腊月廿五,郑州高温达到22摄氏度,破了本地气象纪录,也破了当日除岭南之外的全国纪录。牛年春来早,从2021元月开始。

头年秋冬之际,11月大量开花的枇杷、八角金盘,还有早蜡梅,开了一段时间,进入新年而花谢了。枇杷塔形花,坐了一大咕嘟幼果很明显。此后它再开花,沥沥拉拉开花,不再锋芒毕露。元旦却是冰芯和黄芯蜡梅开花的盛期,它们于蜡梅花里称王,香烈无比。中原和北方,这时候蜡梅花开再好,也不会像巴蜀卖花人背柴火一样,大捆背着蜡梅花进城来。即使在淮南信阳,大别山里人也惜花怜花,舍不得大枝斫蜡梅花。在对待蜡梅的态度与立场上,我们比江南及西南人斯文。

历法在民间有说法,立春当天就可以算是农历的新年开头,辛丑属牛了。一连多日太阳好,大地回暖,常青树和落叶树换了个姿势,纷纷走出寒流突袭留下的阴影和狼狈,挺拔的雪松先回绿,伏地二月兰亦抬头了。因为庚子闰四月,故而辛丑春节迟。去年春节1月25日,今年是2月12日。1999年的春节是2月16日。二十多年来,我经历玉兰逢春节开花有不多的几次,1999年是一次,印象深刻。今年立春而开梅花,我判断今年春节,郑州玉兰花将应时而开。我是有把握的。

人算不如天算——2月6日腊月廿五,早上读写告一段落,吃了东西,我出门看草木萌动苏醒,料不到在隔路小街上,分明一株辛夷树正开花。树不大,它笔直树枝上多是毛笔头一样的灰白花蕾,最上头高高在上,映着蓝天而红花半开,嫩生生的荷花红。它的名字也叫望春玉兰。我拍照了,我很冷静,并没有像早开梅花一样,及时分享到朋友圈,我想独自享受它,安慰我自己黄蜂一样的勤快勤劳。可是,当天手机里“植物星球”杭州李叶飞的公号,曰“今年春来早,玉兰花早开”——西子湖畔的望春玉兰也开花了。别急,“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2月7日夜里,澎湃新闻图文报道,上海在2月3日立春当天,有白玉兰迎新早开!那里的市花白玉兰,和我遇到梅花开满树同一日。顿时,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无限欣慰。

第二天2月8日,腊月廿七,过年的鼓点趋急,街头已经装饰一新,天气又极好,如旧书重读一般,熟门熟路的,我特意在熟悉的路线上穿行——不要说我不稳重,我没法稳重,我为自己准确预报玉兰开花而兴奋,尽管事实上慢了半拍。因此,我也没法不喜形于色。走啊走,走过东风渠,又走过熟悉的金水河和紫荆山公园,老天奖赏我,我竟然依次看见毛白杨辛夷梅花山玉兰和山桃一并开花,而迎春花连绵开得十分烂漫,绿叶都齐全了。

气候暖化实实在在的,不容置疑。原来看梅花,我要等元宵节过了,结伴去南京和苏州看花。2010年,公园建园中园,临着向阳的东南门有了小园“梦溪园”。茂林修竹,芭蕉奇石,大小双池有暗道互通流水,仿曲水流觞……这些都不说,我尤其对那从远方移植而来的早梅和冬红果两种树最为青睐。我记得清楚,那是个落雪的元宵节,城市上午纷纷扬扬下雪,但因为这棵梅花开得好,引人注目,游人打伞绕树看花。有母女两个,都不认识梅花,妈妈说是桃花吧,女儿说,还没有到开桃花时候呀。我听着觉得有趣,却明知不言,我想类似这吸引人的活谜语,现实生活里多一些更好。缘于好奇,使忙忙碌碌的世人,都可以像这一对母女一样,绕树三匝而探秘探花。随后,也就是这十年时间,如今郑州看梅花容易了。东风第一枝,梅花在此也不负盛名。

辛丑牛年春节,政府号召“就地过年”,大城市因此与往年不同,人流减少不多,变得比往年更热闹了。花事讨喜,梅花玉兰山桃花开早,我看花,有喜也有忧,觉得气候有些不正常。转而又想,我们有了充足的疫苗,加上抗疫成功的经验和精神,即使发生别的困难,它难不倒我们,准能克服它。

题图摄影:刘 芳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天津解放的故事(八)

解放初期的天津曲艺

杨楠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曲艺艺人积极响应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曲艺要说新唱新”的号召,排演新节目。随后,一批歌唱新社会的新编曲目被搬上舞台,有常宝堃的《新灯谜》《新酒令》《封建婚姻》和《思想改造》;富少舫的《解放后的新天津》;阎秋霞、林红玉、马书麟等人的《刘志丹》《三勇士推破船》《新十女夸夫》等。据统计,1949年2月至9月间,天津全市142个娱乐场所共演出1584场,其中上演新鼓词六十多段。

天津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天津的曲艺工作,很快就成立了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协会通过曲艺社的形式把天津的曲艺艺人组织起来,进行新曲艺节目的创作和演出。当时有两个比较有名的曲艺社,即大众曲艺社和红风曲艺社。大众曲艺社,设立在玉壶春茶楼;红风曲艺社,设立在燕乐升平茶园(即燕乐戏院,后改为红旗戏院)。由于燕乐升平茶园是天津历史上第一个专门演出曲艺的茶园,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该茶园红极一时,侯宝林就是在这里“从开场第六到说‘大轴’,从无名到有名”。因此,天津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就把燕乐升平茶园(燕乐戏院),作为当时曲艺演出的首选剧场。红风曲艺社演出的曲艺种类十分丰富,有张寿臣、常宝堃、马三立、赵佩茹的相声;白云鹏、骆玉笙、阎秋霞的京韵大鼓;花五宝的梅花大鼓;王佩臣的乐亭大鼓;高元钧的山东快书;石慧儒的单弦;王宝霞、王元堂的河南坠子等。他们都是天津观众熟悉的知名艺人,演出很受欢迎。

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经天津市文化局批准,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成立。该团属民办公助性质,是天津市最早建立、由政府文化部门直接领导的民间艺术团体。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成立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排演新曲词。骆玉笙演唱的京韵大鼓《独胆英雄吕松山》《黄继光》;石慧儒演唱的单弦《劳动模范张淑云》《姚大娘捉特务》;王佩臣演唱的乐亭大鼓《小姐俩捡棉花》;高元钧演唱的山东快书《小大姐翻身》等都在群众中有较好影响。1953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也建立了专业曲艺表演团体——天津广播曲艺团。接着,天津各区也成立了专业曲艺团体,如和平区书曲队、红桥区曲艺团等,这些团队的成员合计有四百多人。此外,业余的曲艺演出团体则有天津市工人业余艺术团曲艺团、西门里曲艺票房等。天津当时的大小书场、茶社有七十多家,较大型的曲艺演出场所有红旗、群英、玉茗春、玉壶春、通海茶楼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艺人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白云鹏在《新生晚报》撰文,明确提出艺人必须肩负三大义务:提倡通俗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常宝堃为了尽快接受革命理论,连续参加军管会文艺处举办的讲习班,被评为学习模范。他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浓缩成两句话:“不学习,不得了!学习了,了不得!”常宝堃还积极探索相声艺术如何适应时代变化,他对传统相声进行整理改编,放弃低级庸俗的段子和不健康的表演,在相声艺术发展史上称得上承前启后、开一代新风的大师。

1951年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成立,作为曲艺工作团业务骨干的骆玉笙,深切体会到自己已经从旧社会的艺人,转变为在国家机构领取工资、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从此再不撂地献艺,闯码头,赶场子,为衣食奔走;不担心失业和为晚年犯愁;他们这一代人已经从艺术和政治上都获得了新生。同时,党对曲艺事业大力扶持,对老艺人的信任爱护,也使骆玉笙明白了曲艺事业要发展,就必须与新时代相适应,必须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勇于创新。她认为鼓曲的创新、演唱技巧一定“要适合内容,做到口唱、心唱、唱声、唱情的统一,轻重、憎爱都要表现出来,生活体验、艺术素养都不能忽视”。骆玉笙正是秉持这一创新原则,上世纪50年代初先后创作出《邱少云》《珠峰红旗》《卧薪尝胆》《飞夺泸定桥》《韩英见娘》《长征》《正气歌》等京韵大鼓新唱段。

与骆玉笙有同样人生经历的马三立说,因为共产党来了,人与人的关系变了,他这个说相声的再不受轻贱了,不再是卖艺人,而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深感过去那不堪回首的困苦、艰难与屈辱,马三立专门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贴在屋里,他有说不出的激动。1950年,马三立加入红风曲艺社。因为他是曲艺社的主要演员,也是国家主人,不再是吃“开口饭”的卖艺人,这种翻身的喜悦让他彻夜难眠,他开始思索相声演员的新使命。他认为过去相声以讽刺为主题,嬉笑怒骂,插科打诨;而新生活为相声演员提供了进行歌颂的主题,促使他们要为新社会和新生活演出,为新社会、新生活创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的曲艺创作十分活跃,天津也形成了一支谙熟曲种、精通曲律、了解演员特长和观众情趣的创作队伍,并在全国名列前茅。天津的曲艺工作者不仅积极创作新节目,还十分重视挖掘、整理传统曲艺的珍贵遗产。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整理出版了著名评书艺人陈士和的评书《聊斋》以及张寿臣的单口相声,还排演了濒于失传的荡调、马头调以及各种小调。天津的曲艺工作者一边对传统曲艺进行剔除糟粕、保存精华的改造,一边进行曲艺的改革与创新,他们为天津曲艺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沽上丛话

九重葛(中国画) 孙凤英

过年红

胡荣华

春节未至时,过年的气氛已经扑面而至。不仅各式红彤彤的年货摆上了商场超市的柜台货架,就连各类电商平台的显示界面都变成了一片打眼的亮红色。

网购买了一条最新款春季红色长裙,寄过来的包装盒里,除了商品本身,还附着一张设计精美、写着春节祝语的红色卡片以及一幅红色的对联。因压力而紧绷的心顿时有些温暖,一边在心里感谢商家的考虑周详,一边佩服他们在创新营销策略中对中华传统春节的“红”文化拿捏得恰到好处。

天津人喜欢红色,过年时对红色的追求更是到了极致。对此,已故的天津文史研究者顾道馨在《绿波集》中说:“天津人过年尤其重红色。举凡青年妇女衣饰鞋袜,室内的炕褥、桌帷椅套,门窗墙壁上贴的春联、福字、窗花,供品中的茶食糕点和苹果、蜡烛和供花,还有拜帖和名片,都要用红色的,偶有红色不鲜艳者也会被指为不妥。”

传统春节期间,天津妇女的打扮,是映入眼帘的所有红色中最令人瞩目的风采。文化人是倍受尊重的群体,春节期间的红衣红裳也屡屡在文化人的妙笔回春中留下芳迹。清代天津有一位隐士写了这样一首过年风俗诗,“新年著个满堂红,颊染胭脂一色同。热闹娘娘宫畔路,香车飞趁夕阳红。”将一群大姑娘小媳妇擦着红脸蛋、抹着红嘴唇,一身红装,往返天后宫烧香还愿,与日月同辉的美丽身姿生动呈现出来。津门文人冯文洵也在《丙寅天津竹枝词》中,以“称体衣裁一色红,满头花插颤绫绒”来描摹普通人家妇女穿周身清一色的正红,以红绒花做头饰的过年装扮。

妇女身上的红装款式常常与时俱进,这也有了红旗袍在特定历史时期威风春节街道的场景。为此,上世纪初年的天津著名书画家王伯龙,作有“照眼旗袍拖地长,绒花压鬓竞时妆。若非‘红孩妖’成队,定是集团新嫁娘”的俏皮竹枝词,描写了上世纪30年代的春节,天津的摩登女性穿着红色旗袍盛装,结伴出游的景象。天津著名报人刘炎臣结合自己对本地民俗的了解,做了恰如其分的批注,“津市新年,妇女咸着大红旗袍,鞋袜中衣,悉为红色,鬓边绒花斜插,皆红丝绒制成,各式吉语,如必定如意、富贵满堂之类,外乡人见之,认作新嫁娘无疑”。天津妇女好热闹,女子们三五成群,穿着凸显身形的旗袍,戴着红头花,遇见熟人互相拜年说吉祥话,既不犯憷,也将讲礼仪、重友情、热心肠的地域性格展现无遗。

除了红旗袍,春节受到天津妇女欢迎的,还有大红色的平底鞋。王伯龙以“小鸟依人出必偕,并肩拉腕步长街。比郎今日矮三寸,新换大红平底鞋”来勾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春节情侣出游约会时,女性的娇艳妩媚。刘炎臣做注释,“津市过年,妇女多喜着大红平底鞋,较平时忽然矮短二三寸,马路边道,姗姗行来,备生姿媚”。脱下了高跟鞋的女人,降低了海拔,在秉持传统观念的旁观者看来,显得更加楚楚动人。于是就有了《北洋画报》提到的“鞋店在岁末时,必赶制各式大红鞋,陈于窗中,亦颇悦目”的年节商业景观。

红色的正装往往搭配红色的装饰。据评剧演员新凤霞回忆,传统中的天津妇女为了好看,身上常常带着一个绣花口袋,挂在裤带上,从衣角下露出一点来,掏钱时有意露出绣花钱包来。绣花口袋根据时节不同,变换花样和颜色,夏天是淡雅的颜色,绣荷花、绣兰花,秋天要明快的颜色,绣菊花,春节时用鲜艳的颜色,用红色绣上聚宝盆、财神爷和金元宝。

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对天津妇女过年期间的红色装扮有这样一段表述,“单说津门妇女,在大年初一,‘千门万户曈曈日’,一开门就一色大红色衣装,从头上绒花(必不可少),直到脚下鞋袜,绝无一丝杂色!那才真正表现出‘喜气满乾坤’‘万象更新’的巨大景色与吉庆心情——这是真天津人的美好创造,独一无二,他处万不能及”。在周汝昌的眼中,天津妇女的过年装饰,是一种能够表现民风乡俗,体现人间喜庆的生活仪式,是一种令人爱不释手的极高艺术创造。因为有了这些红裙红袄的女人,让腊尾年初的天津城形成了一道奇景,“其美无伦”!

周汝昌出生于天津咸水沽镇,少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对天津有着很深的了解和感情。他工作在北京,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资深学者。夹带着对故土的感情,在对北京和天津两处北地年俗的亲身体验和比较中,他认为红是天津色,天津人对红色有一种纯粹的喜爱。天津妇女过的是一个艺术化的春节,展现的是一种不僵不滞、不顽不固、活泼生动、自由新鲜的文化气象。这也让“天津的风土人情自有特色”,值得年轻一代“借鉴而怀思”。

当然,春节穿红的不光是天津女人。传统天津有句民谚:“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要裹脚条(缠足),老头要新毡帽。”本命年系红腰带,穿红衣服也不乏天津男人,但每年的覆盖面毕竟有限。传统天津男士的过年红比较普遍地表现在这顶帽子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传统天津商人的长袍马褂,必戴一顶帽衬,春节拜年时,帽顶换红疙瘩。红帽子毕竟太夸张,但是要在其他素色帽子的顶部点缀一些红色装饰,和平日有别的喜庆气氛就脱然而出了。

满庭芳 第四八四〇期

61 一场特殊的婚礼

“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博真和伍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

“夫妻对拜——革命拥抱!”

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博真和伍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

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

那一刻,沿途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的囚车……那一刻,依偎在爱人胸膛前的伍仲文抬起一双泪眼,仰首凝视着她的新郎蔡博真,而她的爱人则将炽热的双唇轻柔而又坚定地贴向她的双唇……

写这章节时,恰逢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翻阅着一本本革命英烈传记,看着一张张稚嫩而青春的烈士脸庞,我的耳边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说的话:“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近代以来,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青年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

是的,因为梦想和朝气,才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了理想和信仰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年轻的革命者,就是怀揣理想来到上海,来到党的身边,来到革命的中心。他们许多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家庭,甚至是学业,离别了亲人和故乡,只身一人,或结伴而行。

曹顺标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十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室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来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园。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之后在家人的帮助下,他重新在复旦大学高中部和大夏大学高中部读书,而这个时候的曹顺标,虽小小年纪,但已经是一位革命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凭借着“小囡”的身份,散发革命和进步报刊。两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深刻变化,17岁的他,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革命者

何建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

9 学徒制版

当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也并非是平静的,处于巨大社会变革时代的学校,也时刻充满着纷争。冯棣入学的时候,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创校校长刘海粟因“裸体模特风波”已于1928年春辞职,携家眷赴欧洲考察美术教育,这时的校长已几经更迭,1929年时任代理校长的是西洋画系主任王远勃。在王远勃的带动下,学校教学整体上更偏向于西洋绘画专业,冯棣入学时也选择了西洋画专业。因为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立成都师范大学艺术系参加绘制墙报,冯棣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所以在上海美专西洋画系的学习得心应手。从二年级转学而来的冯棣,很快便掌握了木炭、水彩、油画等多种绘画技法。作为上海艺专的佼佼者,冯棣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顺利跨级毕业。

在上海上学的这段时间,冯棣除了在学校学习西洋绘画技法,还经常到报摊上去翻阅各色报纸杂志,既可以了解上海滩的新闻时事,也可以了解十里洋场的娱乐八卦,冯棣对新闻行业的了解越来越深,逐渐萌发了成为一名新闻人的想法。

1931年,冯棣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感到在上海生活压力较大,经与家人商量,决定前往在北平做生意的表哥孙问樵家借住一段时间,并借此机会在北平继续学习一些赖以生存的手艺。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32年年底,在表哥的联系下,冯棣先到位于北平和内东半壁街11号的怀英制版印刷局附设的怀英照相制版印刷学校当学徒(冯朋弟自传中说是“北京怀英制版厂”,并不准确)。怀英制版印刷局在当时采用的是最为先进的珂罗版制版技术,印刷的产品除了文字书籍,还有一些精美的艺术类画册,当时京津冀的官员、文化名流,如吴佩孚、傅增湘、郭则沄、江瀚、江庸、俞平伯等人都曾在此印过书画集。冯棣在这里初步了解了制版印刷的流程与工序,但因经济原因,冯棣无法缴纳学徒所需的全部费用,最终未能学满全部课程,再次失业。虽然冯棣没能拿到印刷学校的毕业文凭,但在这里还是学会了很多与印刷相关的知识与技巧,这也为冯棣日后设计封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考虑到日后的生活,冯棣决定走兄长冯森的道路,成为一名演员,所以他又考入联华电影人才养成所。1931年9月,上海联华公司为满足在北方拍片的需要,开办了联华电影人才养成所,在北平、天津两地招生。北平报考地点在东华门真光电影院剧场内。报考不论男女,只要达到中学文化或同等学历,容貌端庄、体格健美、品行端正即可报名。

104 和杨灯罩儿的旧怨

但刘大头刚到家,就让官府的人堵在屋里了。等进了大牢,又见到李大愣和小尾巴儿,才知道他俩也给抓进来了。李大愣告诉刘大头,官府的人早已蹲在他俩的家门口,就等着他俩回来。刘大头奇怪,官府的人怎么会知道他俩住哪儿,再说他俩是义和团,家门口也没人知道。李大愣说,他也是进来之后才听说的,蜡头儿胡同有个姓杨的,绰号叫杨灯罩儿,这人知道底细,还跟租界的洋人也勾着,是他告诉洋人的。

刘大头一听,这才明白了。

李大愣的大哥,也就是小尾巴儿他爸,在坛里是二师兄,还亲手杀过一个洋人军官,案情重大,只过了一堂,就让官府砍了。小尾巴儿一看他爸给砍了,就急了,天天在牢里蹦着脚儿地大骂。后来官府的人让他骂急了,就把他也砍了。刘大头和李大愣在牢里关了大半年。后来两家儿的人烦人托壳,又上下打点,最后才总算把人放出来。

刘大头从牢里一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杨灯罩儿。但杨灯罩儿这时已听到消息,早钻进租界不露面儿了。刘大头找了几次没找着人,越找不着,心里的气也就越大,于是在外面放出狠话,杨灯罩儿要躲,最好就一直这么躲着,别让他看见,哪天看见了,非活劈了他不可。杨灯罩儿一听这话,果然沉不住气了,先是来找包子铺的高掌柜,想请他出面给说和。高掌柜早就讨厌杨灯罩儿,这次又是为这种事,就推说自己跟刘大头虽认识,但没这么大面子。

烟 火

王松

作家出版社

杨灯罩儿也知道高掌柜不想管,只好又来找尚先生。尚先生这时也已听说了这事。尚先生倒不为杨灯罩儿想,是为刘大头。刘大头的老婆有病,几个孩子还小,家里的日子还得指着他。他这次虽然出来了,可毕竟是花钱出来的,官府的人还一直盯着他。倘再闹出点事,再进去,就不是花钱能出来的了。于是就来找刘大头,对他说,好鞋不踩臭狗屎,俗说话,恶人自有恶人磨,他这种人,以后肯定好不了,你为他再折出去,不值当的。

尚先生这一说,刘大头才把这事暂时撂下了。

刘大头这个晚上打杨灯罩儿,还不光为李大愣侄子的事。

杨灯罩儿这时又在一家叫“爱德蒙”的洋行混事儿。尚先生说,杨灯罩儿有个一般人都比不了的本事,说白了,也就是拆梯子。他只要用着谁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对方对他印象极好,然后迅速拉近关系。等用完这人,觉着没用了,一回头就把这梯子拆了,街上再碰面儿,都不一定理你。然后下一个用着谁了,再想办法搭这个梯子。

杨灯罩儿当初在河北药王庙的洋人医院认识了大卫李,觉着这人是个有用的梯子,于是就扒着搭上了交情。